

爱乐者说

感觉贝多芬

■李近朱

种“英雄壮举”。

但我注意到,他的那些很“英雄”的作品,有时也很感性,很个人。《第三(英雄)交响曲》被称为“英雄壁画”,第三乐章谐谑曲的轻快音符,虽常被“英雄性”乐句打断,但却能感觉到这位不苟言笑的大师性情的另一侧面,亦即活泼的音乐迸发出了幽默感。这位猛狮般的强者,竟透出温馨的另一面孔,全然抹去人们惯常的论述和诠释:那是战士的片刻休憩。而真切乃至也是真实的感觉,则是大师俏皮天性的流露。我想,聆听音乐可以“跟着感觉走”,甚而将自己也放进音乐中。如此,天地可能更宽。

带着这种朦胧意识,放开思路,甚至抛弃了耳熟能详的对于贝多芬其人其作的解释,以自己的感觉,又聆听了他的另一类作品。人们说,贝多芬的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是他写于爱情岁月的“精纯的花”,充满抒情意味。再次聆听,第一乐章那个几乎是“脱口而出”的主部主题,气息宽广,于优美中透出的,是很有分量的大气。这种抒情与凝重的相融,让我震惊。怎么,罗曼·罗兰所说的“猛狮恋爱”时节吐露出的这段绝美旋律,竟也有时代痕迹潜于音符流动中?这种与时代勾连的感觉,来得那么自然且不可思议,这又引我沉思。

我想,人离不开时代与社会。但时代与社会烙印可直接表达,如《第三(英雄)交响曲》所涌出的题材献给大革命风云人物的强烈时代感;也可以间接地个性化地流露出时代的风声雨声,即使为波拿巴这个枭雄而作的雄劲音符,也未必每一小节都紧扣时代脉搏。“战士休憩”中也透出了贝

多芬式的幽默。

我想,时代与社会也可以在个人天地中作个性化表达。个人对他周边世界的感觉,有大有小,但皆系时代与社会。说到底,艺术直白表现时代与社会,或可流于概念;而将大时代大社会与“小我”一己之情融合,则会显出高超的艺术匠心。其实,贝多芬的爱情抒怀同样显现了身处时代风云中的作曲家的高远境界。

我想,听贝多芬就是感觉贝多芬。聆听之刻,将对于他的理解与不理解乃至一知半解全置一旁,不必有框框的约束,也不必囿于理性的指引,首先以自己的感觉去感性地接受大师留给我们的音乐。一次次聆听,一次次感觉,有相同也有不同。如此,便丰富了贝多芬,也充实了自己。

我想,音乐本是感性的艺术。他写我听,往往不一定有多少理性的前提。音乐又是形式的艺术。一个乐思的走向与发展,常为作曲的形式与技巧所驱动。如此,理性空间已经很小了,往往作曲家几乎是无意意识地将自己对于时代与社会的感知,不自觉地注入到音符流向中。音乐中感性和技巧的浑然天成,作曲家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潜藏感知,皆在汩汩流淌。因此,面对作为感觉艺术的音乐,如若框定只从社会与时代一个角度解读,那不仅是狭窄了,或可出现误读。而从无疆界的“感觉”走近贝多芬乃至其他大师,这本身正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对于音乐经典的一种接受方式。

多少年来,我们在听贝多芬,在读贝多芬,在解析贝多芬,在理解贝多芬。我想,我们还应当去感受贝多芬。它也是一个厚实的真实的贝多芬,会贴近地站在21世纪人们面前。

气象万千

【在京津冀地区重霾的同时,气象记录显示现在的风速比过去小了。北京的大风日数与前30年相比,可称是“断崖式暴跌”。】

霾的来势凶猛,危害严重。不论政府或民间,自然都会采取防霾、抗霾措施。由于没有先例,在实践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,因此引起媒体上出现大量的议论甚至争论,这是自然的。因此本节的标题就起名为“霾论”。

见诸报端,政府方面的抗霾措施,最早可溯至2013年。因地形不利,大气污染严重的兰州开始加大马路洒水密度,每天有百余台洒水车和吸尘车在大街作业,每天洒水万吨以上。但从11月开始,兰州气温降到零下,洒水车不仅易浇湿行人,而且还造成地面结冰引发交通事故。到了2014年,西安、张家口等地开始出现雾炮车,到现在已有许多城市使用。例如北京2016年秋扬尘专项治理行动中,就在使馆区、奥运功能区等35条道路进行过作业。

雾炮车原理,是炮口喷出水雾,以沉降雾霾。大型雾炮车可喷射120米远、70米高的水

因为雾霾天多是静稳无风或微风天气,这时北京及周围都没有风,通风廊道作用何在?1998年兰州“削山引风”工程,即削去黄河河谷中兰州以东的300米高的山头,引风驱霾,但最终未能进行。这与当地气象局指出“兰州冬季周围本无风,削了山头还是无风”有很大关系。所以我在2014年于《中国科学报》发的一篇文章里,把通风廊道的作用概括为“少能雪中送炭,主要锦上添花”。

因为从气象学上来说,气压场中有气压差,气流才会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。而严重雾霾天气时处于低压中心区,气压梯度十分微小,通风廊道岂能空穴来风?

在京津冀地区重霾的同时,气象记录显示现在的风速比过去小了。北京的大风日数与前30年相比,可称是“断崖式暴跌”。因此媒体上展开了“谁偷走了北京的风?”的讨论。矛盾指向了内蒙古风力发电场和三峡防护林,说是它们挡住了京津冀的风。

专家们结论倒是是一致的,即,不是。但是理由不同。有专家举出了英国的一个风电场研究结果,说只在下游几十千米到几十千米内有明显影响,而北京距内蒙古风电场有400公里之遥。我不赞成。因为我国过去曾做过许多农田防护林带减小

“戏说”霾论

■林之光

雾,可连续喷洒1小时,覆盖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,一度被称为“抗霾神器”。但有专家认为,雾炮车主要对降扬尘(PM10级)有效,但对消除二次形成的污染物等PM2.5级的细粒的作用效果甚微,而且费用高,清除范围有限,这里刚清掉,别处的雾霾又过来了。

据《时事热评》中指出这个“游戏”中可能存在的猫腻:从全国来看,环保测点1/3设在中空空气污染较轻的公园,雾炮车又频频被派在监测点附近喷洒。雾炮车之所以能在许多城市中得到推广应用,乃因“企业得订单,政府得政绩,官员得利益,民众看到了低的污染数据”,可谓“共赢”。

政府部门进行治霾的第二个办法是,由气象部门试验人工消除雾霾。气象部门虽然确实曾经在机场等地成功进行过人工消雾,但问题是,雾消了,大部分霾粒还在。靠冲刷、吸湿沉降掉的霾粒主要是扬尘,这点和雾炮车的消霾效果差不多,而且也只有消局部,不能消大范围雾等问题存在。所以气象部门的人工消霾目前还处于试验研究阶段,因此在2013~2014年热过一阵之后,已暂时淡出人们视线了。

与此同时,也传出了“无人机消霾”的说法。即让无人机飞上天空,布撒干冰、液氮等催化剂,使冰核迅速形成雪花而降落消失(人工消冷雾);或布撒盐粉尿素等催化剂,形成水滴并迅速吸湿长大,下降途中冲并小水滴而降落消失(人工消暖雾)。它和前述人工消雾实际上是一回事,只不过一个在空中,一个在地面作业罢了。所以“无人机能消霾”乃误读。

政府部门治霾的第三个大动作是建设城市通风廊道。国内许多城市都正在进行或计划之中。例如2016年2月9日北京市宣布规划建设包括5条宽500米以上的1级通风廊道和多条宽80米以上的2级通风廊道。廊道内由于狭管效应,像房屋的穿堂风一样,会增大风速,把受污染空气更快地输送出去。这种方法国外有成功的先例。例如德国慕尼黑,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北坡一条南北向完整河谷之中,当地盛行越阿尔卑斯山来的南风气流,晚间还有山风帮助,污染大气得以沿河谷、沿城市南北走向楼群间的通风廊道很快输送出去。

但是通风廊道方案也引起很大争议。它作为自然生态建设的意义很大,对减轻城市热岛效应作用也是肯定的。只是它作为消霾方式有争议。

一座武夷山半部茶叶史

■杨化高

【武夷茶发于商周,始于唐,兴于宋元,衰于明而盛于清,历史久远。】

武夷山,群峰相连,峡谷纵横,九曲溪萦回其间,得天独厚的土壤资源,尤其适合茶树生长,如陆羽《茶经》所言“上者生烂石,中者生砾壤,下者生黄土”。武夷岩茶的发展离不开天地的滋润,乾坤变化,时光流转间,武夷岩茶愈发独特和丰富。

武夷茶发于商周,始于唐,兴于宋元,衰于明而盛于清,历史久远。历经宋元明清四朝的制茶技术不断革新深化,除千余年的单一绿茶外,还创制了驰名世界的小种红茶和武夷岩茶。

早在商周时,武夷茶就随当时“濮闽族”的君长,会盟伐纣时进献给周武王了。秦汉时有简单加工,鲜叶捣成饼状茶团或蒸叶捣碎制成团茶。

唐代之初,多为饼茶。蒸青团茶已成主要茶类,也有晒干的叶茶(白茶)。饮用时,加调味烹煮汤饮。“晚甘侯”是武夷茶别名最早的文字记载。

宋代,饮茶风气盛行,各地产茶不下百种,仅贡茶就几十种。此时的武夷茶是北苑贡茶的主要货源,运往建州进贡。随着茶品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讲究,出现了“斗茶”,建人谓之“茗战”,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代开始,至明出现巨大变化。

元代的统治者嗜茶成性,且颇有品茶功夫,武夷茶便成了首选,于是在元代武夷茶正式成为贡茶。元大德六年(1302年),朝廷为了监制贡茶,特地在武夷山的四曲溪畔设置“御茶园”,长达255年,团茶始汰,散茶发展。

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皇帝朱元璋诏令产茶地,禁止蒸青团茶,改制芽茶入贡。废团兴散,除蒸青团茶以外,出现了炒青绿茶以及红茶(正山小种)、黄茶、黑茶,直接晒干的白茶也同时存在。可以说,明代已出现了五大茶类,包括武夷正山小种红茶。明代后,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。清正、袭人的茶香,甘冽、醇醇的茶叶以及清澈、明亮的茶汤,凸显茶之天然香味品质。

到了清代,除五大茶类外,又出现了青茶的制作方法,也就是乌龙茶的创新。采摘后摊放,即晒青后摇青;摇到散发浓香就炒、焙、拣。王草堂《茶说》证明在清代初年以前,已制成了“半发酵”的武夷岩茶,“半青半红”恰当地展示了武夷岩茶的“绿叶红镶边”的特色。

《易·说卦》云:“坤也者,地也。”武夷岩茶,关键在“岩”,岩主土,土者,地也。“坤”,意为乾坤,天地也。天地之妙,在于天地的神奇创造力和赋予万物力量。

赋予者,尚坤。执著于武夷岩茶,执著于一片叶、一座山和半部史。武夷山的自然与文化充满了奥秘,不如与一位尚“坤”者且事茶多年的茶人,共同分享一杯武夷茶的香、清、甘、活,领略一份静品中的幽香美意,讲述一段武夷岩茶的历程。从唐宋元明清的“土”到“岩”的技艺行变,获得“岩韵”的惊喜。

一座武夷山,半部茶叶史;千载儒释道,万古山水茶。无数的武夷尚坤者满怀敬意,对武夷山水及武夷茶珍品般的追寻,在东方智慧与美的历程中,找到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介质,以空间换时间,在静品花侍,大美不言。



我记得,亲爱的,记得你那爱我的闪光,命运使我离开了你,我的心沉重而悲伤。我记得那些秋夜,白桦树影在摇曳,愿白昼变得短暂,愿月亮照得时间更长。我记得你对我说:「美好的年华就要变成以往,你会忘记我,亲爱的,和别的女友成对成双。」今天我菩提树又开花了,引起我心中无限惆怅,那时我是何等温柔,把花瓣撒落到你的鬓发上。啊,爱恋别人心中愁烦,我的心不会变凉,它会从别人身上想起你,像读本心爱的小说那样欢畅。(刘湛秋、茹香雪译)

我记得 (俄罗斯)叶赛宁

阡苑有书

现代版僵尸故事

■星河

【这就是所谓的群体的残暴,这就是多数人经过举手表决的暴虐与恶行。】

在很久以前的录像时代,看过一部美国版的鬼片,后来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没有翻译,没有字幕,所以开始只能猜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一些“鬼”被释放出来,开始危害人类。但后来就越来越明白了:这些“鬼”会攻击人类并致人死亡,而且最令人无奈的是,死去的人马上会化作新“鬼”,像原来那些旧“鬼”一样攻击人类。这就很麻烦了。被攻击的人类要等待袭击,要么将对方打死也就等于制造了新“鬼”。一时间人类几乎陷入绝望。最后,当所有的“鬼”云集一处准备向人类发起总攻时,总统按下了核按钮……当时我就想:虽说核选择往往是人类无可奈何下的最后选择,但被核弹毁灭后的“鬼”们,难道不会全部化作更高级的厉“鬼”?

这是一类典型的“吸血鬼”故事,因为在传说中某些吸血鬼的特征就具备“吸血”的传染性:一旦被感染,马上同流合污,成为吸血鬼的新帮凶。在欧美文化中,有关吸血鬼的故事数不胜数。但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个离奇传说而真的具备现实基础;英年早逝的科幻作家柳文杨生前曾撰文分析过这一现象,援引的资料中就详细提及:历史上所谓吸血鬼也许只是某种厉害的传染病患者罢了。前述铺垫,主要是为了引出韩国电影《釜山

行》。其实《釜山行》的科幻因素很淡,但这部作品在因突发事件而解读人性方面,与科幻作品可谓异曲同工。封闭的火车环境,随时可能遭受传染的险境,《釜山行》却把这种危机感具象化了——不再是病毒感染而导致患病继而再导致传染,而是受害者一旦被咬马上感染接着便成为施害者,立竿见影,见血封喉。

面对这种情形,逃生自然是第一要务,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此。但是,还有另外一重隐含的恐惧,那就是当事者往往会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: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,一旦被吸血鬼尸袭击咬中,马上就会改换门庭,成为极具威胁的新吸血鬼尸。在影片中,当一行人越过危险车厢前往安全车厢的途中,那位男中学生就面临了这一难题。

在上述那部美国鬼片里,就充斥了一条又一条这样的“传染链”。最后一组封闭房间中的镜头:年轻男子躺在恋人年轻女子的怀里奄奄一息,但他刚一死亡马上反扑过来。最后,一名老者带领年轻女子逃上房顶,他揽住女孩,把枪顶在她的头部——只要那名男子冲上来,他就射杀女孩,然后自杀。最后一个镜头,就是男子一拳击开楼顶的隔板——画面就此定格。

然而,这恐怕还不是最令人恐惧的,最让人震惊的,是健康者为为了保护未感染群体的“纯洁性”,对于从感染者那边逃过来的幸存者,采取了一种拒绝接受的态度:冷漠只是最轻微的,更严重的就是拒之门外——锁住通道门,宁愿眼看着他们死于吸血鬼尸手下,也不肯开门施救!

——这就是所谓群体的残暴,这就是多数人经过举手表决的暴虐与恶行。

所以当侥幸逃生者被大多数人驱逐时,一名年轻的女中学生跟着被驱逐的同伴离开,因为她认为——“在这里我觉得更可怕”。

又是一番感染与减员,最后主人公小女儿的父亲,一个曾经十分自私而在这场浩劫中终于回归正直的男人,知道自己被感染后将会变得多么可怕,于是毅然跳下了机车——洗净罪恶,彼岸重生。

——也许这部影片在告诉我们,也许我们早已被这个社会玷污了,但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坚守底线,不去害人。

绝望永远没有终结——当孕妇和女童这最后两名幸存者穿过隧道向前走来时,在无法确定她们是否被已感染的情况下,上级居然下令射杀!她们逃过了千难万险,却真的无法逃脱来自友军的子弹?不错,有时为了整体是要牺牲局部或者个体的利益,有时甚至不是利益交换而是生命的丧失,但那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,绝非一种可以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。近年来,一些理性到极致到极致的科幻作品似乎开始大肆宣扬这种观念,打着为了全体的旗号对个体疯狂绞杀,这难道就是我们对绵延了数千年人类文明的有效表达吗?

孟德斯鸠说过:对一个人的不公,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。